

论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的婚恋伦理书写

胡莎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新时期初期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婚恋伦理书写背景和话语风格。本文从社会伦理与个体经验交锋、婚恋伦理书写的规训与释放等角度,探讨分析在国家政治话语大背景下的社会经济转型期,小说如何书写和反思婚恋伦理。

[关键词]婚恋伦理;历史情感;女性主体;爱与自由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8.706

一、社会伦理与个体经验的交锋

新时期初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完整性和自足性,一方面使得权力话语体系得以在中西方思潮涌动的背景下,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掌控力和优越性;另一方面,由于“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心理创伤没有消弭,《归宿》、《高洁的青松》、《月食》、《天云山传奇》等小说关于婚恋伦理的书写,与“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 社会理性与历史情感

小说《归宿》中的陈慧芳等候了她的丈夫杨剑平二十二年。在这沧桑而漫长的时间里,他们如何度过?作者只用了一句话概括:“为了她,他受尽煎熬无怨;为了他,她历尽辛酸坚守。”在情感时间长河中焦灼等待的人们,身心都受到了沉重的折磨。透过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视角,身份预设为痴心盼夫归的陈慧芳,即便是受尽了旁人的轻慢和冷落,对于陈慧芳的内心情感活动描写过于简约。小说《高洁的青松》中,陈静没有坚守人格底线向“四人帮”投降,为了和丈夫“划清界线”,她选择离家出走,似乎有《玩偶之家》娜拉的踪影。然而,如果我们结合时代背景、社会人格及婚恋伦理分析,陈静和娜拉本质区别在于对待“爱与自由”的认知与践行。“爱与自由在词源上的密切关联,表明此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本无法分离的。”^[1]娜拉的出走原因在于,她曾迷失彷徨在本我存在的十字路口,而当她觉醒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时,选择离开玩偶之家,追求其在社会空间中应享有爱与自由的权利,她“成为人和成为自由是一回事”^[2],这都源于她的命运感。而《高洁的青松》中的陈静,离家出走显然是在赌气怨恨,是一种没有责任感的任性和漠然,与爱与自由背道而驰。可以设想,由于她缺乏爱给予的感激和动力,即使陈静出走后再次回归,也无法指向女性的重新出发和再创造。可见,由于创作背景和理念的束缚,小说在料理人物关系和人性情感时有所顾虑,不能不说是时代的遗憾。

(二) 国家政治话语与个体话语

茹志鹃、李国文、鲁彦周等作家对小说创作话语模式进行了再创造。这些作家面对的不仅是“文革”后百业待兴的社会现实,还有亟待重建的生存荒景和价值废墟,以及人性和真情的回归。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延续着对生命价值和历史伦理的拷问,开掘出富有包容性与生活气息的国家政治话语与个体话语融合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模式。

李国文《月食》中的主人公伊汝,本来是报社记者,因被错划为右派遣往边地。复职后他立刻赶回山村,希望能故地重寻他和妞妞的爱情。从那以后他们彼此信任,感情日益深厚,他们的爱情经过国家政治理想和历史回忆沉淀得到了理性升华,在历史理性主体的建构中消弭了性别差异,爱

情演变成了社会公民之间的情感观照。《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坚韧不拔,讲究情义。当罗群身陷危机之时,宋薇和他划清界限,而冯晴岚清醒认定只有她能给予罗群关心与帮助。“她不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爱情,而是主动找寻这种需要自己为之牺牲的爱情。”^[3]爱情正因为“有了被赋予正义反叛力量的可能,故而其意义必是出于对某种桎梏的反抗以及对个性权利的捍卫。”^[4]冯晴岚明知这样注定会影响她的未来命运和生存境况,却依然坚定地为了罗群付出真心。她所执着的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爱情,还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理想的色彩,爱情再次被概念化和理念化,由于冯晴岚放弃了捍卫自身的个性权利,也就意味着被消解了其固有的反抗意味。

(三) 历史经验与女性主体意识

《黑骏马》中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之间的爱情似乎完美的无懈可击,但在索米娅遭到黄毛希拉的奸污之后,他们的爱情开始有了裂痕。曾经索米娅那的大眼睛,眸子深处那么晶莹。之后她的小心迟疑,似乎含着敌意的警惕。在索米娅的传统爱情理念和历史认知中,她的灵与肉只能属于白音宝力格一人,一旦被其他男性剥夺了贞操,就意味着对他的不忠。事实上,索米娅对于两人的爱情做了估量与权衡,并自觉认定双方价值存在不对等,而且一旦她的自身价值发生了崩塌,应该由女性而非男性来承受所有错误,不论这种错误是否由她自己造成的。因此索米娅选择主动逃离这份爱情,以免继续陷入煎熬与恐惧。然而白音宝力格却只关注自己的委屈而忽视了索米娅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委屈与痛苦演化成了愤恨与复仇,两人的爱情最终走向了陌路。

新时期初期小说具有一致而特定的婚恋伦理书写方式,历史情感与个人体验被化约为集体意识理性化的阐释,尤其是女性主体建构和反抗意识出现了情理之中的集体缺失。

二、婚恋伦理书写的规训与释放

(一) 传统制度规约下的婚恋困惑

张弦《银杏树》、《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宗璞《三生石》等小说揭示了“文革”对婚恋情感的漠视和压抑,也表明“传统习俗本身也是一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可见经济法则是如此强烈地制约着爱情与婚姻”^[5]。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展示了母女两代在婚恋伦理上的状态异同。作品不仅揭示了两性婚恋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制约,也预测了婚恋伦理观念变异的可能性及结果。《银杏树》同样传达出受到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文化习俗观念等限制的婚恋观念,以及人们社会心理困惑和压抑等多重影响。此外,成一《绿色的山岗》、叶文玲《小溪九道弯》等小说通过对婚恋问题的“暴露式”描写揭露了“左”倾错误与社会转型初期婚恋问题迭出的原因,造成物质精神双重贫困的后果。

（二）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婚恋两难选择

从历史背景看，新时期初期的集体经济开始转型，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在用工制度和劳动形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别。《人生》高加林正是这种境遇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是当时的高加林们最想成就的梦想之一。但也正是城镇乡村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高加林在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代婚恋观念间一直徘徊，最终陷入婚恋抉择的伦理困境。尽管乡村淳朴宁静，但城市生活优势明显，强烈吸引着他。这种愿望促使他狠心选择离开养育他多年的乡土，离开他的巧珍，去城市追求雄心壮志。

可以说，高加林是没有历史感和命运感的乡土叛逆者，他向命运挑战的壮举给他带来更多的无奈和烦恼。事实上，高加林们从一出生就注定要和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爱情与事业等矛盾绑定。他当初离开故土和巧珍，意味着他有了和故土决裂的强烈意识，他与故土的情感契约从此断裂。但由于与黄亚萍恋爱未果，高加林不得不告别城市，转身踏上返乡旅程后，失落地发现巧珍已另嫁他人。高加林的人生饱含奋斗激情与感情两难的双重性，他在事业和感情上的不自觉的轻重权衡，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婚恋伦理观念的普遍反映。

以上分析的这类小说都强调了一点：城乡观念与制度约束着两性婚恋。即在集体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城乡户籍制度等因素虽然不是婚恋抉择与结果的决定因素，但也制约了当时人们感情方向和交往对象，尤其是在面对城市的巨大诱惑时，高加林们面对道德与人性、传统恩情与现代爱情的权衡，构成了他们这类人物婚恋伦理抉择的特质。

（三）古典与爱国融合的婚恋理想追求

《彩云归》充分展现了作家对传统古典式婚恋的怀旧传承与创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国民党某绥靖区少将军医主任黄维芝随部队在刚刚光复的J市古城集结待命。他很想把日夜想念的夫人钟离秀兰接来团聚，可是未果。时隔多年，女子李笑珍（黄维芝侄女）因家境所迫成为导游，因受不了侮辱而要投湖自尽。正在这时朱义解救了她并鼓励她勇敢活下去。爱情的萌芽却在重重压迫中萌动了。他们规划着今后的共同生活。然而当笑珍提出要离台回归大陆寻找她妈妈钟离秀兰时，朱义决定跳海。因为他觉得“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追求到它，我不知道有什么牺牲不能作出！”而他们传奇般的相爱，对曾经沧海的黄维芝来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惊奇。但笑珍的想法令他很受震撼：“对于我们来说，什么宗教信条，圣贤教义，都是不一定要效法的偏见，大可以各取所需，甚至可以演绎改变，不变的只有我的血，我奔流全身的热血。”“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情的骏马向我奔来了，我必须抓住它的缰绳，去追逐我毕生以求的目的。”不同于明清古典小说中的缠绵悱恻，这部小说话语风格浑厚有力，而这种力量又和祖国大陆对宝岛同胞亲切的呼唤联结在一起。将古典情感、思乡之愁与爱国理想升华为爱国主义并为之交融，在读者中产生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

三、新时期初期小说书写的婚恋伦理反思

当我们从婚恋伦理角度重读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作品，如《爱情的位置》、《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淡淡的晨雾》、《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爬满青藤的木屋》、《在乡场上》、《爱的权利》，我们发现这些小说突出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初期，人们对婚恋伦理的认识与追求，以及在处理自身事业发展与婚恋伦理关系时存

在的困惑和误区。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品都初步具有突破“十七年”小说以来的爱情写作“禁区”的勇气，并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婚恋伦理反思。其主要原因有社会文化背景变迁；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作家创作理念的更新与释放；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影响等。其中，对于当时引起社会轰动和争议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老作家黄秋耘曾评价道：它“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它能让我们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枷锁是那么多？……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6]他的这些发问与反思，是对当时这一类小说创作反映出的婚恋伦理共性问题的精辟概括。可以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小说在关注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中女性情感生活的同时，超前思考了当代中国式婚恋伦理的潜在问题。而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第一次描写了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及当代女性的内心情绪与感受，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体验的丰富，小说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的创作理念是持续变化的，是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与反抗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多元化。而她的另一部小说《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和《在同一地平线上》共同点在于，都提出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男女如何分工，女性的情感需求与主体建构如何达成，男女之间情感与事业如何做到平衡等社会突显的问题，不仅充实拓展了小说中的婚恋题材领域，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

四、结语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婚恋伦理书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紧密相连的，小说作品触及乃至超越了社会现实中人们婚恋问题的矛盾，同样也展现了在新时期转型时期婚恋伦理观念和心态的变化历程。虽然理想状态的婚恋伦理观念具有超前性和发展性，在当时不能完全得到读者的一致认可，有些小说甚至引起强烈的争议和不解。但我们要知道，婚恋伦理叙事是小说永恒的主题，是推动小说家不断思考时代与命运、人生本真价值的引擎，也是考验小说家思想深度广度的最佳化合试剂，它呼唤着新时期小说创作推陈出新，持续突破和超越已有的创作理念和艺术形式，尤其多关注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精神成长，将新的载体和新的意境代入作品创作与反思中。

参考文献

- [1]路文彬. 现代启蒙时期的自由话语误读——以胡适、鲁迅等人为例[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4.
- [2]汉娜·阿伦特. 过去与未来之间[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11: 159.
- [3]吴子敏. 道德观念上的歌颂与谴责: 读《天云山传奇》随笔[J]. 文学评论, 1980(5): 106.
- [4]路文彬.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婚恋话语迷思[J]. 南方文坛, 2017(2): 12.
- [5]舒家骅. 简论新时期的爱情伦理小说[J]. 大理学院学报, 1994(2): 51.
- [6]黄秋耘. 关于张洁作品断想[J]. 文艺报, 1980(1). 作者简介:
胡莎(1985-), 女, 汉族, 江西人, 博士研究生在读, 华北科技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